

評 Ruth Mostern, “*Dividing the Realm in Order to Govern*”: *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ong State, 960-1276 CE*

Cambridge, MA: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, 2011. xix, 370 pp.

吳挺誌\*

國家(或政權)要如何管理其所控有的領土? 管理方式有何變化? 國家管理領土的方式如何反映當代人的思維模式或地理觀念? 要如何研究上述這些問題? 這是《分土而治——宋帝國的空間架構》(“*Dividing the Realm in Order to Govern*”: *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ong State, 960-1276 CE*)一書中所要回答的問題。<sup>1</sup>

作者馬瑞詩(Ruth Mostern)，現任職於加州大學梅西分校(University of California, Merced)。作者於 2003 年獲加州大學博克萊分校(University of California, Berkeley)的歷史博士學位。研究專長是歷史地理，曾在《國際地理資訊科學學報》(*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*)、《歷史學方法》(*Historical Methods*)的期刊上發表多篇刊物。<sup>2</sup>

---

\* 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

<sup>1</sup> 宋朝滅亡的年代，北美漢學界習慣標註於 1276 年，而中文學界習慣標註於 1279 年。為便於說明，本文下面提到宋朝的延續時間，會以作者的標準 (960-1276) 為準。

<sup>2</sup> 作者中文譯名及背景介紹，筆者參考自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網

本書修改自作者的博士論文。<sup>3</sup>特別之處，在於使用作者自製數據資料庫以及地理訊息系統(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, GIS)分析資料並呈現研究成果。<sup>4</sup>出版之後，受到歷史學界一定程度的重視。以筆者所見，英文世界至少已有五篇書評。<sup>5</sup>筆者相信，重新檢視作者關懷的議題以及相關評論，有助於我們了解國家空間管理以及 GIS 在歷史學方面應用等相關議題。

作者認為，國家的管理方式會影響地方人民的活動，反之亦然。其實，古人已發現了這個現象。在本書的開篇(Prologue)中，作者引用

---

站。網址：[http://yugong.fudan.edu.cn/views/news\\_index.php?tpid=100&list=N&id=9](http://yugong.fudan.edu.cn/views/news_index.php?tpid=100&list=N&id=9)，擷取日期：2014 年 12 月 1 日。

<sup>3</sup> Ruth Mostern, "Apprehending the Realm: Territorialit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Song China, 960-1276 CE," (PhD diss.,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, Berkeley, 2003).

<sup>4</sup> 蘇基朗 (Billy K. L. So) 稱這是他所知第一部使用 GIS 研究中國史的著作。見 Billy K. L. So, review of "Dividing the Realm in Order to Govern": *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ong State (960-1276 CE)*, by Ruth Mostern, *Journal of Song-Yuan Studies* 42 (2012): 501-502.

<sup>5</sup> 包括 Jennifer W. Jay, Review of "Dividing the Realm in Order to Govern": *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ong State (960-1276 CE)*, by Ruth Mostern, *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* 117, no. 4 (October, 2012): 1198-1199; Naomi Standen, Review of "Dividing the Realm in Order to Govern": *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ong State (960-1276 CE)*, by Ruth Mostern, *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* 71, no. 2 (May, 2012): 532-533; Billy K. L. So, Review of "Dividing the Realm in Order to Govern": *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ong State (960-1276 CE)*, by Ruth Mostern, *Journal of Song-Yuan Studies* 42 (2012): 501-507; Nicolas Tackett, Review of "Dividing the Realm in Order to Govern": *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ong State (960-1276 CE)*, by Ruth Mostern, *Law and History Review* 31, no. 2 (May, 2013): 471-473; Robert Hymes, Review of "Dividing the Realm in Order to Govern": *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ong State (960-1276 CE)*, by Ruth Mostern, *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* 73, no. 2 (December, 2013): 361-377.

南宋人蔡戡(1141-?)的言論，說明行政區域的政治、社會意義。作者指出，行政區域與社會網絡、軍務、貿易、運輸等自然人文環境息息相關，行政區域會影響上述環境，而上述環境變遷也可能使行政區域重新劃分(頁 2-5)。

行政區域的變遷既然如此重要，自然成為作者研究的焦點。作者主要的關懷核心是宋代行政區域的變遷，<sup>6</sup>聚焦在州、縣此二級行政區域的置廢(establish and abolish)。主要問題是，宋代國家如何劃分其領土？<sup>7</sup>基於何種原因劃分領土？有何趨勢？作者的對話對象是受到郝若貝(Robert Hartwell)研究影響甚深的北美漢學界。<sup>8</sup>受到郝氏的影響，北美漢學界特別注重地方精英(local elite)在地方的活動及影響，比較不重視政府組織的變遷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(頁 24)。<sup>9</sup>然而作者指出，無論人口或社會結構如何變動，推動行政區域劃分的原動力終究是「政治的」(頁 34)，而宋代密集的行政區域以及政府頻繁的變遷州縣，也顯示了宋代國家的進取心態(state activism, 頁 22)。雖然有評者認為，作者的研究內容有些忽視地方勢力對行政區域變遷的影響，<sup>10</sup>不

---

<sup>6</sup> 韓明士稱這是他所知第一部討論空間管理變遷的中國史著作。見 Robert Hymes, review of “Dividing the Realm in Order to Govern”: *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ong State (960-1276 CE)*, by Ruth Mostern, 361.

<sup>7</sup> 書中「國家」的涵義等於「中央政府」或「朝廷」。

<sup>8</sup> Robert Hartwell, “Demographic, Political,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, 750-1550,” *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* 42, no. 2(1982): 365-442. 對北美漢學界這個「郝若貝模式」的評價，可見 Luo Yinan (羅禕楠), “A Study of the Changes in the Tang-Song Transition Model,” *Journal of Song-Yuan Studies* 35 (2005): 99-127.

<sup>9</sup> 美國學者對宋代政治史缺乏興趣，見方震華，〈傳統領域如何發展？——對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幾點觀察〉，《臺大歷史學報》，48(臺北，2011)，頁 172-174。

<sup>10</sup> Robert Hymes, Review of “Dividing the Realm in Order to Govern”: *The*

過，從作者課題的選擇(州縣：國家劃分領土的結果)，以及本書的書名「(國家)分土而治」，都可以看出作者本來的意圖即是將研究焦點放在國家上。

經由州縣數據的統計與比較，作者發現北宋帝國在所有的統一王朝中(這裡的朝代比較沒有南宋，頁 21)，其縣州比(country to prefecture ratio)是最低的(這表示宋代州與縣的數目最接近)。州的分布在北方邊陲地區較江南核心地區密集，縣的分布則相反(頁 28-30)。對此，作者引用社會學家查爾斯·堤利(Charles Tilly)的研究取徑加以解釋。堤利認為因應收稅與戰爭，國家的財政機構和軍事機構會有不同空間分布。財政機構可能依照人口分布的情況配置，以利於收稅；而軍事機構則可能依照戰爭要地而分布，以利戰爭進行。因此，國家必須劃分不同的財政地理與軍事地理(distinctive fiscal and military geographies)。<sup>11</sup>

作者認為，在宋代，這種軍事財政地理的分別表現在州縣分別上，州負有國家軍事機能，縣則負有國家財政機能。國家在北方邊陲多設州以加強邊防，在江南內地多設縣以多徵稅(頁 27-30)。這個州縣的軍事財政地理分立的分析架構貫串全書，用以解釋宋代州縣行政區域分布的特色。

全書分為開篇，以及正文六章。作者首先介紹宋代國家的行政區域。第一章說明宋代州縣沿革的特色以及作者的理論依據。第二章建立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基本常識。第三章討論宋代地理的書寫，聚焦

---

*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ong State (960-1276 CE)*, by Ruth Mostern, 376-377; Naomi Standen, Review of "Dividing the Realm in Order to Govern": *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ong State (960-1276 CE)*, by Ruth Mostern, 533.

<sup>11</sup> Charles Tilly, *Coercion,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, 990-1992* (Cambridge: Blackwell, 1992), 125.

在地圖、全國總志、地方志的書寫。

在這些背景之上，作者繼續討論宋代國家州縣變遷的特色。作者在書中分別討論宋代地方行政區域沿革的三階段：北宋初年、變法時期，以及南宋初年。第四章討論北宋初年政府經由變遷州縣加強控制地方，重建朝廷權威，以建立統一帝國。第五章說明北宋中期變法時期的州縣沿革。變法派持續廢除內地州縣，在減輕財政負擔的同時強化中央權威，並支持西北邊境的領土擴張，使朝廷在西北邊境建立州縣。第六章討論南宋州縣變遷。因南宋初年國土縮減與難民安置問題，使朝廷必須調整州縣，使行政區符合新的新時代的人口、市場分布。州縣置廢頻率在南宋中葉以後下降，直至南宋亡。

文末的附錄介紹了與本書同時完成的數據資料庫。作者為了完成本書，特別建置了一個數據資料庫(與 Elijah Meeks 合力完成)，名為「宋代地名地理資料庫」(The Digital Gazetteer of the Song Dynasty, DGSD)。<sup>12</sup>紙本與數據資料庫相輔相成。資料庫呈現宋代州縣變遷模式，紙本文字解釋宋代州縣變遷的緣由。本書的附錄中特別介紹此資料庫，而在作者的個人履歷中，也將本資料庫視為重要出版。<sup>13</sup>這顯示資料庫對本書以

---

<sup>12</sup> 數據資料庫目前仍架設在加州大學梅西分校圖書館的網站上，網址：<http://songgis.ucmercedlibrary.info>，擷取日期：2014 年 12 月 1 日。資料庫提供學者下載研究。此資料庫根基於一本著作，名為《中國宋代地名錄》(Hope Wright, *An Alphabetical List of Geographical Names in Sung China*. Paris: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, Centre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, 1956.) 作者為了擴充資料庫，也參考了其他重要歷史地理參考書，以及歷史地理資料庫，如 China Historical GIS、Hartwell GIS、「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」網站。網站及書本的中文譯名參考自中央研究院數位人文學研究室，網址：<http://www3.ihp.sinica.edu.tw/dhrctw/index.php/2014-06-12-08-44-54/2014-06-16-08-13-55>，擷取日期：2014 年 12 月 1 日。

<sup>13</sup> 見作者在梅西分校的個人頁面，履歷：<http://faculty.ucmerced.edu/rmostern/mosternCV1110.pdf>，擷取日期 2014 年 12 月 1 日。

及作者個人的重要性。

此資料庫的特點在於詳盡羅列了宋代大多數行政單位的變遷與特色，包括路、州、縣，甚至縣之下的鎮、監、城寨。這些行政單位的置廢時間、管轄所屬(屬於何路、何州)、位置(經緯度)、等級(上州、次州、赤縣、緊縣)、特色(有鹽市)。資料涵蓋範圍也包括先前資料庫比較缺少的宋代北中國。<sup>14</sup>依據這個資料庫，可以繪出宋代特定年代的行政區域分布，也可以比較宋代不同年代的行政區域。本書的許多地圖、表格正是依靠此資料庫而繪成。

本書在中國史研究方面可謂開創了一個新的里程碑，其優點如下所述。

其一，使用圖表呈現研究結果。用文字描述州縣的置廢，不但有些枯燥，也讓讀者難以理解。作者將原為博士論文附錄的內容，包括隋唐元明清州縣置廢數據以及宋代州縣置廢表電子數位化，改以分布圖、長條圖、折線圖的方式呈現，穿插至正文各章節，使讀者一目了然，輕易了解宋代州縣變遷的特色以及宋代某一時期州縣變遷的特色。而使用地圖呈現作者研究範圍，也使讀者輕易了解文字敘述的內容。

其二，微觀巨觀並呈的研究方式。研究歷史常會陷入設定研究範圍的兩難。研究範圍過大，無法細緻的呈現各時段、區域的特色，忽略了歷史的多元。而研究範圍過小，常給人見樹不見林的感覺。空間變遷的研究也是如此，長時段內有某些原因持續影響空間分布，個案也有特殊原因影響空間配置。作者所採取的方式是多樣並呈。作者首先說明終宋一代影響州縣置廢的重大原因：戰爭與變法。而在各小節中，也會以個案說明特定時段某區域州縣置廢的原因，如第四章分別

---

<sup>14</sup> Nicolas Tackett, *Review of "Dividing the Realm in Order to Govern":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ong State (960-1276 CE)*, by Ruth Mostern, 471.

對四川、廣南、江南、福建、遼夏邊境的個案研究(頁 131-162)，以及第六章對隨州棗陽縣(頁 244)、江陰軍(頁 247-248)等州縣的個案研究。這種巨觀微觀並呈的研究方式使讀者更接近歷史全貌。

其三，結合歷史場景說明歷史變遷。行政地理變遷這個主題初看有些枯燥，只是單純討論州縣置廢的歷史無法令讀者產生共鳴。是故，作者在討論州縣變遷會多方面交代其歷史背景。例如討論到變法時期(這包括慶曆改革與王安石變法)的空間變遷時，先從北宋中期的危機談起，接著提到范仲淹(989-1052)、歐陽修(1007-1072)、王安石(1021-1086)等人倡議改革(頁 169-171, 182)。結合歷史場景、士人理念與制度變遷的歷史敘述，使這段州縣置廢的歷史更加有血有肉，也增加讀者的臨場感。

當然，本書的論點也有一些值得討論之處。

首先是州縣軍事財政地理分立論，大多數評者對此並沒有多加評論，有些評者認為這是作者的學術貢獻。不過，韓明士(Robert Hymes)不大同意這種州縣軍事財政分立的區分方式，他認為這種區分忽略了州的財政機能與縣的軍事機能。<sup>15</sup>我們可從「州級政區」(即作者的prefecture)的財政機能、「縣級政區」的軍事機能，以及宋代國家劃分不同的軍事地理與財政地理等方面討論這個主題。<sup>16</sup>

<sup>15</sup> Robert Hymes, Review of "Dividing the Realm in Order to Govern": *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ong State (960-1276 CE)*, by Ruth Mostern, 372.

<sup>16</sup> 周振鶴把中國歷史上地方行政單位分為三個層級：在基層的「縣級政區」、統轄「縣級政區」的「統縣政區」，及在「統縣政區」之上的「高層政區」。在宋代，「縣級政區」主要是縣，「統縣政區」主要是府、州、軍、監，「高層政區」主要是路。因此作者書中的 *prefecture*，就等於周氏所謂「統縣政區」，即管理、統治「縣級政區」的行政單位。不過，「統縣政區」這個名詞，實在不夠直觀，可能會令讀者疑惑。筆者在這裡說明時，仍以「州級政區」表示這些管理「縣級政區」的行政單位。周氏的分類見周振鶴，〈行政區劃史研究的基本概念與學術用語芻議〉，《復旦學報》，2001：3(上海，2001)，頁 32-33；周振鶴、李曉杰著，《中國行政區劃通史·總

作者由軍事財政分立區別州縣的機能，原因為作者觀察到在宋代邊境地區，政府設立了許多州以防衛領土，而此處縣的數目偏低。<sup>17</sup>其次，宋代的州有一些負責軍務的職缺，北宋初年的禁軍也以州為單位配置。此外，作者也認為州財賦使用受限於朝廷以及州的上級——路(circuit, 頁 45-46)。作者認為縣缺乏州所擁有的軍事機能，州的財政機能受限，所以認定州負責宋代國家的軍事機能。

作者此論提示了我們注意州的軍事機能。此外，宋代州的軍事官員以及駐軍，也多於縣。或許正如作者所言，州的軍事機能大於縣，而宋代邊區所設立的州，具有很強的軍事機能。如果學者能進一步衍生作者的論點，分析宋代邊區州的分布，觀察這些州與其他軍事要點的關係(如互相支應)，或許能更一步說明宋代州的軍事機能。

不過，這種州縣軍事財政分立論卻有些忽視州的財政機能。就算我們承認宋代政府有集財中央的傾向，<sup>18</sup>州對地方財賦仍有一定的支配權，州級政區仍是「一個完整的地方財政管理級別」。<sup>19</sup>其實，作

---

論、先秦卷》，收入周振鶴主編，《中國行政區劃通史》(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9)，頁 9-10。

<sup>17</sup> 要注意的是，有些邊區，例如北宋河北地區，雖然縣的數目與州的數目十分接近，縣州比極低。但其實此處縣也相當密集，每個縣管理的範圍也不大。不能單純從縣州數目接近來推斷此處縣的數目偏低。河北地區縣州比偏低的理由是州十分密集，以及作者忽略了「縣級政區」的存在，討論詳下。宋代各地區縣的密集程度，可見馬玉臣，〈從縣的密度與官民對比看宋代冗官〉，《河北大學學報(哲學社會科學版)》，30：6(保定，2005)，頁 17-18。

<sup>18</sup> 梁庚堯，〈宋代財政的中央集權趨向〉，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討論會秘書處編，《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五屆討論會·國史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》(臺北：國史館，2000)，頁 563-581。

<sup>19</sup> 包偉民，《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》(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11)，頁 35-39。



者並沒有否認州的財政機能。作者認為宋代州仍保有民事、財政、軍事的權威(頁 39)，也提到州徵收其管下縣的賦稅、分配州內資源、上繳朝廷(頁 44)，同時言及州的財政必須供應一州之花費(頁 45)，也就是說州仍具有一定的財政機能。如果說州的駐軍大於縣，州的軍事機能大於縣，則我們也可以說州的稅收大於縣，州的財政機能也大於縣。因為州是縣的上級單位，縣的大部分事務都要上報到州，所以州的所有機能(軍事、財政、行政、司法等)可能都大於縣。於此，作者只需要強調州的軍事機能即可，不一定要把州縣分立(何況，州縣為上下隸屬的行政單位，兩者不必然是分立關係)，而將兩者視為宋代國家軍事機能與財政機能的分立。

作者在書中將州縣分立視為軍事財政分立的另一原因，是作者忽視了縣級政區的軍事機能。更進一步說，作者不但忽略了縣的軍事機能，也忽略了某些隸屬於「州級政區」的軍事行政單位。

關於縣的軍事機能，韓明士已引述了作者的論點，說明作者也承認縣可管轄鄉兵，縣尉有責帶領弓手捕盜。韓氏甚至引用南宋人胡穎(約卒於 1265-1274)的言論，指稱宋人自己也承認知縣的軍事職責。韓明士後文稱他不熟悉北宋的情況，他推想另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：也許知縣在南宋才開始具有軍事職責。<sup>20</sup>不過，北宋的司馬光(1019-1086)其實說過與胡穎類似的話。<sup>21</sup>如果再對照學者對於宋代知縣的研究，<sup>22</sup>可

---

<sup>20</sup> Robert Hymes, Review of “Dividing the Realm in Order to Govern”: *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ong State (960-1276 CE)*, by Ruth Mostern, 373-374.

<sup>21</sup> 李燾撰，上海師大古籍所、華東師大古籍所點校，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)，卷 355，元豐八年四月條，頁 8499。

<sup>22</sup> 齊覺生，〈北宋縣令制度之研究〉，《國立政治大學學報》，18(臺北，1968)，頁 300-306；齊覺生，〈南宋縣令制度之研究〉，《國立政治大學學報》，19(臺北，1969)，頁 309-320。又「知縣」或「縣令」都是縣的

知不論北宋或南宋，縣首長一直有捕盜與守土的責任。很難說縣沒有軍事的機能，或者直到南宋知縣的軍事職責才提高。縣所控制的軍隊的確不如州，但這是因為州是比縣高一級的行政單位，州縣軍事職權的區別在於職權的大小，不在於職權的有無。

關於作者忽略了某些隸屬於「州級政區」的軍事行政單位。作者強調「州級政區」的軍事機能，原因為作者發現到某些為軍事目的而設置的「州級政區」：「軍」。作者將所有隸屬於路的行政單位：「州級政區」（府、州、軍、監）都視為一種州。作者視「府」為比較重要的州、「軍」為軍事化的州，「監」為礦冶州（頁 41-44）。所以當北宋在遼、夏邊境設置了許多軍事化的「軍」，作者可以稱宋代為了國防，在北方設置許多「州」。如此，自然凸顯州的軍事性。

然而，相較之下，作者忽略了某些為軍事目的而設置的「縣級政區」。宋代有一些隸屬於「州級政區」的堡、寨。這些堡寨是宋廷為了防禦敵軍與佔有領土所設置的軍事行政單位（頁 174）。<sup>23</sup>這些堡寨和其他隸屬於「州級政區」的行政單位，理論上與隸屬於「州級政區」

---

首長。大體而言，宋代較高階官員任縣首長稱知縣，較低階官員任縣首長稱縣令。學界一般稱宋代縣首長為知縣，上文齊覺生也是這麼認定。只是齊文的標題仍是用縣令。

- <sup>23</sup> 余蔚把宋代最基層行政單位「縣」歸類為「縣級政區」，把隸屬於「州」、「軍」（州、軍即「統縣政區」）的「堡」、「寨」也歸類為「縣級政區」。李昌憲視這些「堡」、「寨」為特殊的「縣級政區」。見余蔚，〈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〉（上海：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論文，2003），頁 15；李昌憲，《中國行政區劃通史·宋西夏卷》，收入周振鶴主編，《中國行政區劃通史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7），頁 108-112。這類堡寨在宋代的臨敵地區，如河北、河東、陝西、四川、兩廣地區都有。目前學界比較了解的是陝西地區的堡寨。如江天健，〈北宋陝西路沿邊堡寨〉，收入江天健，《北宋對於西夏邊防研究論集》（臺北：華世出版社，1993），頁 9-42。

的縣同級。這些隸屬於「州級政區」的行政單位，與縣合計，可共同歸類為「縣級政區」。但作者並不將這些隸屬於「州級政區」的堡寨和其他隸屬於「州級政區」的行政單位視為一種縣。所以當宋廷在邊區設置堡寨時，作者的統計也不會增加縣的數量，自然傾向認定縣沒有軍事機能。<sup>24</sup>

當然，為了不同的軍事以及財政需求，如作者所言，宋代國家軍事機構的分布仍有可能不同於財政機構，宋代國家仍可能具有某種程度的軍事機能與財政機能分立。作者提到，南宋時因為民兵的普遍推廣，軍隊配置開始脫離州的管轄，州境劃分可以比較不考慮軍事防禦需求(頁 227)。其實，這個情況並非始自南宋，而是自北宋已然。自從北宋將兵法實施後(大概在宋神宗[1048-1085, 1067-1085 在位]統治中後期實施)，將官——在各地駐紮的軍事將領，已控制了大部分的禁軍(宋代正規軍，非民兵)，使州控制的軍隊數目下降，將官成為地方正規軍實際的管理

---

<sup>24</sup> 附帶一提，作者於討論宋代的縣時，大多只單純討論縣，而不討論和縣同級的「縣級政區」。然而，作者在引用他人的統計數據時，引用他人「縣」的數據卻可能是「縣級政區」的數據。例如在第一章討論中國歷代的縣州比時(頁 21 表 1.1)，作者統計「縣」的數據其實是「縣級政區」的數據。究其原因，因為表 1.1 所謂「縣」的數據，作者參考自周振鶴的數據，而周振鶴統計數據的「縣」其實就是「縣級政區」的數據。但作者在圖示宋代的州縣變遷時，所依據的資料是作者自己所製作的數據資料庫(詳下)——當中只有「縣」的資料，而沒有全部「縣級政區」的資料。依據資料的不同，使作者在不同章節，對所謂「縣」有略為不同的定義。「縣」與「縣級政區」的數目差距歷代不同。魏晉南北朝時代，學者只有「縣」的統計數據。北宋以後，學者已經能分別統計「縣」與「縣級政區」的數據。元代以後，朝廷設置了一些隸屬於「統縣政區」，但並非縣的「縣級政區」，因此「縣」與「縣級政區」的數據，有一定程度的差距。例如明代「縣」與「縣級政區」的統計數據，分別是 1138 與 1427。相關討論可見周振鶴，《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》(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5)，頁 207；周振鶴、李曉杰著，《中國行政區劃通史·總論、先秦卷》，頁 67。

者與訓練者。<sup>25</sup>將官有各自的駐紮地，各自有管轄的軍隊，其範圍(將官軍區)也不同於州界。<sup>26</sup>這或許可看成是不同的軍事地理與財政地理(把將官管轄範圍視為軍事地理，州境視為財政地理)。

將兵法軍隊脫離知州管轄的精神在南宋為屯駐大軍(南宋的正規軍)所繼承。南宋有屯駐大軍約十支，受都統制管理，分別鎮守在軍事要地。雖然尚不明白屯駐大軍是否有如同將兵法般的軍區設置，但屯駐大軍不受各地知州管轄則可肯定(有些都統制會兼任知州，但這是軍事首長兼任民政首長，並非知州可管轄屯駐大軍)。<sup>27</sup>因此，這類軍事財政地理分立的軍政配置，可能在南宋也存在。從這個角度論及軍財地理分立，或許會比從州縣分立的角度討論要更加準確。

另外一個值得討論的議題是 DGSD 數據資料庫與 GIS 研究歷史地理的相關問題。本書標榜以 DGSD 數據資料庫與 GIS 研究歷史地理，或許可稱為數位人文研究的成果。<sup>28</sup>如此，若作者沒有數據資料庫及 GIS 的輔助，可能做出與現有相差不遠的研究成果嗎？

筆者閱讀全書的結果，認為就算沒有 DGSD 數據資料庫及 GIS 的輔助，作者仍能作出與本書相差不遠的研究成果(姑且假定繪製地圖不算研究成果)。畢竟，本書大多數的內容，在沒有 DGSD 資料庫的時候，

<sup>25</sup> 王曾瑜，《宋朝兵制初探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)，頁 95-106。

<sup>26</sup> 吳挺誌，《北宋中後期的文臣統兵——以陝西沿邊五路經略安撫使為例(1038-1100)》(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，2011)，頁 63-69；伊藤一馬，〈北宋陝西地域の將兵制と地方統治体制〉，《待兼山論叢》，史學篇，46(豐中，2012)，頁 3-10。

<sup>27</sup> 王曾瑜，《宋朝兵制初探》，頁 146-155。

<sup>28</sup> 數位人文，「意指的是那些唯有借助數位科技方能進行的人文研究。反過來講，數位人文的研究，即是企圖尋找在前數位時代中難以觀察的現象、無法想像的議題與無法進行的研究。」相關討論可見項潔、涂豐恩，〈導論——什麼是數位人文〉，收入項潔編，王泰升等著，《從保存到創造——開啟數位人文研究》(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11)，頁 9-28。

於作者原博士論文中就已出現。而作者的主要論點，州縣軍事財政分立論，在博士論文中已有雛形。<sup>29</sup>此論點為作者觀察所整理宋代州縣分布統計的結果，並非倚賴 GIS 而得出的結論。

當然，GIS 還是可以對歷史地理研究有很大幫助。蘇基朗(Billy K. L. So)已指出，本書地圖的地形投影有些模糊，地圖上也沒有繪製河流。<sup>30</sup>蘇基朗沒有明說的問題是，作者沒有在地圖上呈現出地形分布、交通路徑與行政區域分布之間的關係。<sup>31</sup>其實作者已注意到交通與州縣分布的關係，例如討論到南宋淮南州縣分布(頁 234)，以及南宋四川興元府的位置(頁 235)，作者都提到這些據點鄰近道路或河流。只是作者未對此多加申論，匆匆帶過，而地圖上也沒有呈現交通路徑。

學者對城市、據點的研究已指出據點與交通路線的關係。程龍對北宋陝西地區的城寨研究，已指出某些城寨依附交通要道或河谷而建，以佔用自然資源或便於糧草輸送。<sup>32</sup>嚴耕望討論城市或據點的位置時，也常指出歷史地圖上的地理行政點，相當比例與路徑或河流相關。<sup>33</sup>上述例子顯示，城市據點與交通路線的關係。而善加運用 GIS 的功能，比對古今地圖，可以發現僅用人力研究而無法發現、呈現的古代路徑。於地圖上總體呈現交通要道與據點，藉以研究國家的據點分布情況以及道路發展模式，正是 GIS 可發揮作用之所在。雷晉豪透過交通要道

---

<sup>29</sup> Ruth Mostern, "Apprehending the Realm: Territorialit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Song China, 960-1276 CE," 110-111.

<sup>30</sup> Billy K. L. So, *Review of "Dividing the Realm in Order to Govern":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ong State (960-1276 CE)*, by Ruth Mostern, 506.

<sup>31</sup> 其實本書有些地圖有等高線投影，只是作者並未就此加以深論。

<sup>32</sup> 程龍，《北宋西北戰區糧食補給地理》(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6)，頁 34-38。

<sup>33</sup> 例如嚴耕望對於唐代河套地區諸據點位置的討論。見嚴耕望，《唐代交通圖考》(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85)，卷 1，頁 222-224。

路線的考察，已經建構出周代國家的立國形勢與權力結構。<sup>34</sup>這是往後學者可進一步發揮之處。當然，必須承認要如此研究十分費力。要在資料庫中輸入路徑資訊相當不容易。唐史學者有《唐代交通圖考》作為參考書，<sup>35</sup>耗費了六年時間，才完成了「唐代交通地理資訊系統」。<sup>36</sup>宋代的資料遠多於唐代，又無《唐代交通圖考》這類厚實的交通路徑參考書，建置路徑資料庫難度可能遠勝唐代，並非短時間可成。不過，相形之下，輸入水道資訊並沒有這麼困難(較大的問題是河流改道)。而透過建構地形、水道與據點的關係，討論並比較不同時期的立國形勢，則是歷史地理學者可以努力的方向。

不過，在呈現研究成果方面，筆者認為作者得到 GIS 非常大的幫助。因為州縣分布用地圖呈現最為清楚。作者意圖為呈現宋代州縣變遷的趨勢。這個趨勢，可以由統計表格呈現，就如同作者原博士論文；也可以由 GIS 與地圖呈現，如同本書。兩相比較，讀者可以發現，用表格呈現，除非如同作者耗費大量時間閱讀，否則不易看出當中變化的趨勢。地圖呈現的方式清楚許多，讀者一目了然。

此外，使用地圖還可以呈現出特定時段的州縣變遷，並比較之。作者在本書中只用幾張圖，幾頁的版面，就比較出不同時段的州縣分布特色。而如果只用表格比較，不但耗費版面，讀者也較不易看出不同時段的變化。當然，這些地圖都可以以人工手繪，不需倚賴數據資料庫與 GIS，只是相較作者的數位製圖，人工手繪地圖顯然事倍而功

34 雷晉豪，《周道——封建時代的官道》(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1)，頁 154-168。

35 嚴耕望，《唐代交通圖考》(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85、1986、2003、2007)，全 7 卷。

36 目前資料庫架設在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的網站上，網址：<http://gissrv4.sinica.edu.tw/gis/Tang.aspx>，擷取日期：2014 年 12 月 1 日。

半。<sup>37</sup>

上述意見，多少有些吹毛求疵。<sup>38</sup>本書作者由州縣變遷的角度討論宋代歷史的演進，並檢視空間劃分的政治、社會、歷史意義。其研究方式，不論是巨觀微觀並重的研究方式，章節的安排與調整，還是以 GIS、圖表為輔助研究工具，都增進我們對歷史的理解，其研究手法和視角也值得研究者學習。欲學習如何架構歷史專著的研究者，本書值得參考；對歷史地理有興趣的學者，本書更是必讀。

(本文於 2015 年 1 月 13 日收稿；2015 年 9 月 21 日通過刊登)

<sup>37</sup> 附帶一提，作者在繪製及呈現地圖時，有時沒有考慮到地圖的年代，有可能會混淆讀者。例如地圖 2.1 (頁 42) 所呈現州的分布，其實是兩宋三百餘年的累積，但因為沒有標註，讀者可能會誤以為這是宋代某特定年的州分布。明白的說，這張圖的問題是時空錯置。讀者可以在這張圖上的兩浙地區找到紹興府 (升格於 1131 年) 與慶元府 (升格於 1194 年)，這兩個府在北宋 (960-1127) 只是州的等級，直到南宋 (1127-1276) 才升格為府 (府可說是比較重要的州)，顯然這張地圖顯示的應該是南宋時的行政區域分布 (至少在南方)。然而，這張圖的疆域，又明顯是北宋的疆域圖。所以這張圖就包含南宋的行政區域以及北宋的疆域。因此，這張圖是作者為便於說明，將宋代不同時期地理特徵融合在一起而繪成的圖。這張圖不可能出現在宋代任何一年，是張假想圖。作者未加以說明，可能會讓讀者困惑。

<sup>38</sup> 本書另外偶有一些不影響主要論點的小錯。有些可能是打字錯誤。如頁 240，高舜應為高舜舉；頁 242，李春年應為李椿年；頁 243，唐等二州應為唐鄧二州，而該條引文註腳 (頁 311 註 69) 引李心傳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，卷 242 應為卷 142。書中引用提利書名 Coercion 皆誤為 Coersion。史料解讀的問題，值得討論的有兩段。頁 244-245 討論隨州棗陽縣的升格問題，棗陽軍在宋代其實很長一段時間都是「軍」，並非如作者所說，很快的就降格為「縣」。又頁 248，作者討論江陰軍的降格問題，這段作者的解讀和作者引註出處《宋會要輯稿·方域》當中的內容有明顯的落差。作者在此可能有些誤讀。